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构建中国宗教学

吴云贵^①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根据几十年来自身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以及所在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多年来的学术活动和学科建设历程, 阐述了对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解、认识和建议。作者坚持认为,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体系, 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原则, 唯此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宗教学 三大体系建设

作者简介: 吴云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始建于1964年, 是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宗教研究工作的批示精神成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主席批示最重要的词句, 是要求创建的这个研究机构要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 意即世界宗教研究所从成立之日起, 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建所的指导思想。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宗教研究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引领作用, 直接关系到学科建设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问题, 对此需高度重视。

一、在科研实践中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

早在1954年, 毛泽东主席就明确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A。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有力保证。科研工作当然也不例外。因此, 从我们走向宗教研究岗位的第一天起, 在所长任继愈先生的教导下, 我所所有研究人员, 都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宗教的理念。尽管如此, 由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 除了少数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外, 许多人过去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础理论匮乏, 很难胜任研究工作的需要。为此, 所领导在建所之初就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培养研究人员的必修课, 还专门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宗教读本。^B 此项工作成为初生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基础工程项目。由于这个理论读本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编写的, 对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等方面的诠释难免有某些失当之处, 但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诠释人类宗教现象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

在科研实践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深化了科研人员对宗教研究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坚定了努力做好宗教研究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在宗教研究中应当怎样体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指导作用? 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 都直接关系到宗教学学科的建构, 需要从理论上做出明确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是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根本保证。数十年来, 经过宗教研究工作实践的磨练, 如今我所许多长期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同事都明确认识到, 所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固然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宗教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论述, 但更为重要的, 是指当年马、恩在论述宗教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诚如

A《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

B《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 内部发行。

吕大吉先生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实际上是指马、恩在研究宗教问题时所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因此，如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来研究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宗教现象，也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指导作用。^A如果此说不谬，那么我们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过程中，应当更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避免“死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问题的具体言论和个别论断，防止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和解读倾向。

回忆几十年前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笔者深深地感到，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受到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和影响，会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当年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认为新中国的宗教应当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但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宗教无法为社会主义服务，似乎又无法认定宗教属于新中国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宗教是旧中国社会制度的一种“遗留”，理由是人们的宗教意识通常要落后于社会存在。这种模糊不清的认识表明，尽管通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大家都认识到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认识方面的根源和人为的阶级社会根源，但对人类宗教现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广泛的群众性缺乏了解，因为当时谁都没有接触过具体的宗教和宗教信仰者群体，谁都没有想到宗教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只有临时来所工作的一位解放军宣传队的军官在一次随意性的讲话中告诉我们，“以后你们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宗教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而这位军人从未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宗教的文字。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五十余年，我却经常念念不忘，由此我悟出了两个道理。一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需要“与时俱进”，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旦脱离了实际，便无法获得真知，而且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必要性

宗教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属于新兴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如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思想观念的更新，理论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宗教政策方面的相应调整，为宗教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同改革开放前相比，新时期我国宗教研究领域发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宗教研究机构明显增多。过去专业性的宗教研究机构只有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家。今天许多省市地方和部分高校都有了规模不一的宗教研究机构。部分高校还开设了宗教学方面的课程。其二，研究领域明显拓宽，研究成果不断推出，支持宗教课题研究和机构设置的经费显著增长。如今全国各地推出的研究成果已经广泛地覆盖了各大主要宗教相关内容，包括史学著作、哲学著作、概论著作、各种主题的学术专著、通俗宗教知识读物、与宗教现状和宗教事务管理相关的论著、调研报告以及词典、工具书等各类出版物，可谓应有尽有。其三，宗教研究方法仍以传统方法为主，但研究路径愈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社会历史现象，有其生成、发展演进直至最终消亡的规律性，因此从史学角度研究宗教的方法广为流行。但与这种“历时性研究”不同，与比较宗教学密切相关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如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路径，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重视，成为历时性宗教史学的一种补充。如果关于某一宗教历时性的研究相当于“树木”，那么静态、定格的总体宗教共时性研究也就相当于“森林”。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两种路径尚处在“各说各

A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话”的状态。如果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固然是一种偏失，但如果完全不识树木，森林也便无从谈起。二者如何理顺关系，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尤为重视“宗教文化学”研究，这同研究主体宗教观念的充实、更新、改变密切相关。人类各种宗教固然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但这种社会现象又是通过宗教的文化形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在文化形态上，各种宗教文化都以唯心主义宗教信仰体系为依托和本质特征，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与我国近现代兴起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相区别。

数十年来，尽管我国宗教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不足之处也非常显著。最突出的问题是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不能充分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国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们，大都赞同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为指导来构建中国宗教学，为此需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并在学科建设中加以体现运用。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多年来投入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力量较弱，推出的研究成果相对要较少一些。此外，也很少举行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当然，这一领域也有少量水平很高、颇有影响力的成果，如吕大吉先生撰著的《宗教学通论新编》以及高师宁研究员撰著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A这两部著作篇幅大小不一，内容不尽相同，但都从学科建设角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具体内容，包括宗教的本质、宗教的起源、发展演变、宗教与其他社会文化形态的关联、宗教的社会功能等各种问题的论述。这两部力作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宗教学的三大体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学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和著述，期望看到更多的高水平的宗教学基础理论著述。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相对滞后，同我国宗教学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我国高校历来不开设宗教学方面的课程，这种状况只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才略有改变。这种文化知识结构性的缺失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使我国知识界普遍不大了解宗教，因而从事专业宗教研究的学者都是从哲学、史学、外语等专业背景“改行”过来的，带有“先天性”的不足。“马哲”背景的学者理论水平较高而普遍缺乏宗教专业知识，而熟悉各大宗教历史知识的学者一般又都不大关注宗教基础理论研究，这种两难困境如不改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很难达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高水平目标和要求。而宗教研究基础理论薄弱又会直接影响到宗教学学科建设。学科体系不健全通常是新兴学科的常态，而我国宗教学就属于新兴学科，缺乏长期的学术理论积累，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短时间恐怕难以改变。学术体系不完整有多种表现，不仅宗教学研究使用的理论、思想、学说、词语概念多种多样而缺乏严谨的规范，方法论上更是“各说各话”，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西方宗教学的方法论缺乏交流沟通，没有交流融合。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表达、反映和传播方式，学术体系不完整，宗教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当然也就不够完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东西方宗教之间差别很大，即使是同为东方宗教或文化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也各有自己的习惯话语和表达方式。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之所以“非常必要”，从学科建设角度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需要在构建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过程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统领作用、指导作用和协调整合作用。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在革

^A高师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命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和运用。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不同场合就此做过许多重要指示和论述。关于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要现实意义，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A关于有关部门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职责，习近平同志明确指示：“党校、干部学校、社会科学院、高校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B关于哲学科学工作者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习近平同志对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C习近平同志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注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核心问题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为谁著书、为谁立说，也就是要解决好立场问题。树立听党的话、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信念，才能在科学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引领作用，才能使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里所谓立场问题，也包括世界观、价值观问题。我们尊重宗教信仰者的选择和价值取向，但作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可以像宗教界那样“在教言教”，因为如果从宗教信仰主义出发，我们无法在宗教学研究及著述中坚持科学理性原则。这同我们党尊重宗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立场没有关系，属于另一领域的问题。因为不信仰宗教而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宣传和践行科学无神论，也同宗教信仰自由一样，受国家宪法保护。

三、构建中国宗教学的代表性论述

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诞生，标志着现代中国宗教学的开端。但宗教学是否会构成一门科学，人们普遍心存疑虑。所以在建所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只讲“宗教研究”，而闭口不提“宗教学”这个词语概念。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奠基人任继愈先生，直到1979年才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宗教学”一词。长期专注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吕大吉先生，也只是在1989年出版的《宗教学通论》中才开始使用“宗教学”这一学术称谓。两位学术大家对宗教学的理解和诠释，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差异。今天，深入研究他们各自的理论思想，对于我们构建中国宗教学体系十分必要，因为他们的理论观点不只是个人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宗教学术界的思想观点。

在构建宗教学学科体系问题上，任继愈先生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宗教学和科学无神论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的构建与科学无神论的立场、原则和态度是密不可分的。他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而奋斗》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各种宗教的产生、发展及其走向消亡的规律的科学；宗教学既要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以及宗教在

A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2月3日。

B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

C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社会历史上的作用，也要研究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政策等方面。”^A 显而易见，任先生对于宗教学学科建设的理解和构想是以当年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宗教研究工作的批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宗教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实际上也就是具体地落实毛主席批示精神。建所之后陆续设立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学原理、科学无神论、道教、儒教等研究室，都是根据批示的精神成立的，体现了宗教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和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的内容。

任继愈先生把创建中的中国宗教学称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有其深刻的含义。在他看来，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宗教学堪称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从而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突出特征是坚持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研究主体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其研究宗教的宗旨、研究领域的区分、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工具等方面都明显有别于信仰主义的“在教言教”式的研究。众所周知，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些论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当时欧洲基督教的本质和消极社会作用的批判，这种批判构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旋律。受其影响，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的中国学术界，在认识和看待宗教问题时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毫无例外地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但任继愈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宗教的批判是有分寸的，只限于对宗教神学思想所体现的谬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以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地位。总之，任先生强调研究宗教必须批判神学，而批判、否定错误的理论思想不仅也是一种研究，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宗教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任继愈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的导言中表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如何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我们长期努力实践的课题。在宗教学研究领域，任先生同样抱此信念，即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研究、认识和解读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宗教现象。任先生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诠释宗教。例如，在同一篇导言中，任先生明确指出，“宗教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歪曲的反映。它立足于信仰和虔诚，而不是立足于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论证；它祈求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拯救，而不是激发人们自身的聪明才智；它指示人们向‘上帝’投降，而不赞同人们向压迫自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进行反抗。”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任先生所主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宗教学的确切含义，也即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宗教研究的实际内容密切相结合。经过努力，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任先生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继任继愈先生之后，吕大吉先生在其《宗教学通论新编》^B一书的导言中表达了他对构建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问题的系统观点。吕先生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这一词语概念，但他同样主张构建“我们自己的”宗教学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与此同时，在方法论等方面也要积极借鉴近代西方宗教学的有益经验和研究成果。吕先生的基本理论思想观点，似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人文学科的“宗教学”与“宗教观”既有联系，又有明确的区别。宗教观是指人们关于宗教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和认识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宗教，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附属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具体内容和论

A 任继愈：《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而奋斗》，《哲学研究》1979年第4期。

B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述散见于马、恩的著作之中，没有为我们这些后人提供现成的“宗教学”学术体系。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宗教学体系，要求我们用创造性的劳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具体内容进行系统化的处理，作为宗教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其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固然包括马、恩经典作家关于宗教问题的具体论述和理论思想，但它主要是指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为工具来分析包括宗教现象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包括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等相关理论原则，在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的本质和功能时，仍然具有比较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也是我们构建中国宗教学的重要指导原则。“该借鉴的就要借鉴，能应用的就要应用。”

第三，构建中国宗教学体系，首先需要考虑和解决的学术问题是独立的宗教学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具体内容、范畴和方法论问题。为此，需要认真研究19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的比较宗教学，以便吸纳、借鉴其有益的研究成果、研究路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其历史局限、理论缺失，避免简单地复制和套用西方宗教学的理论框架。比较宗教学者并非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们对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对各种宗教现象的分析，一般都抛弃了“上帝启示论”，消除了人类宗教现象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其研究成果具有某些科学的因素，应予肯定。但西方宗教学的局限和缺失也很突出。西方宗教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演进，连“宗教学”的具体名称都定不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研究主体深深地受到了实证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实证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根据可感知的经验知识来研究和描述宗教现象，而不研究和揭示现象背后的宗教的本质。不研究中国古人称之为道的形而上问题，只研究称之为器物的宗教现象，实际上是刻意为西方宗教神学保留一块世袭的神圣领地。研究宗教而又闭口不谈宗教的本质，拒绝回答上帝神明是否存在的问题，这样的宗教学实际上没有与宗教神学完全划清界线。

第四，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参考借鉴西方宗教学体系中具有科学性的某些内容，构建中国宗教学的框架体系。所谓宗教学，可以界定为“认识宗教现象的本质，揭示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宗教学研究只有透过外部宗教现象认识和把握宗教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宗教学研究的具体对象或内容，应当包括宗教构成的基本要素（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行为和宗教制度），以便把宗教与其他非宗教文化形式区别开来；此外，还应当包括宗教史学、宗教哲学等内容。除了宗教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之外，还有研究方法问题，同样值得密切关注。除了借鉴西方宗教学各分支学科（宗教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应当成为中国宗教学研究不可替代的指导原理。

吕大吉先生所著《宗教学通论新编》一书是我国宗教学术界关于构建中国宗教学体系问题最完整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在本书框架设计中所提出的“三编”，实际上也体现和表达了他对构建中国宗教学体系的理论思考。也就是说，宗教学的理论框架和具体内容，应当涵盖“宗教的本质及其表现”、“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和“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政治、宗教与道德、宗教与艺术、宗教与科学）三方面的内容。

四、在继承与发展创新基础上构建中国宗教学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宗教学的起始点不论从新中国诞生算起，还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算起，都是一个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学科体系不健全。笔者在前文中之所以要引用和介绍任继愈先生和吕大吉先生关于构建中国宗教学体系的理论观点，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总结两位学术大家的基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就学科建设

问题展开讨论，以深化认识。

总体而言，两位学者对于构建中国宗教学体系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即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宗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理论基础。任先生明确提出构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奋斗目标。吕先生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学说有其自身的特色，即在理论和方法上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说明有关宗教的各种问题。因此，这一宗教学说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A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宗教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学科三大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之过去都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尽管如此，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学科建设、完善学科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依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学科建设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应当“补齐短板”“完善体系”。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还把包括宗教学在内的一些学科列入“对哲学社会科学有支撑作用的学科”，需要加强完善。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笔者深深地感到，我们每一个从事宗教研究工作的专业学者，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做出应有的贡献。下文仅就宗教学学科建设问题谈几点个人的意见和思考。

首先，关于学科的名称和性质。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虽有一些学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事宗教研究，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他们在宗教研究中从未使用过“宗教学”这一名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从事宗教研究的部分学者开始使用“宗教学”这一称谓，但在对这一词语概念的具体诠释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确认和强调现代宗教学研究源自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由于中国学术传统中未涵盖现代宗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论，因此构建中国宗教学应当虚心地向西方学习，积极吸纳和借鉴西方宗教学的理论思想和有益的研究成果。但在我看来，这种吸纳和借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内容，而决不意味着要用西方宗教学的理论体系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基础。道理很简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而西方宗教学各学派都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例如，西方宗教学已有150余年的历史，迄今却连宗教学的具体名称都无法确定下来，有的称为比较宗教学，有的称为宗教史学，这足以说明对学科的性质和内容认识不清。西方宗教学只把“宗教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而普遍拒绝讨论宗教的本质，拒绝回答上帝神灵是否存在的问题，这种局限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世界观全然不同，属于不同理论体系。

关于学科的性质。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宗教学在我国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宗教学在基础理论方面离不开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它同哲学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目前，我国高校凡开设宗教学课程的，几乎都设在哲学院系，都把宗教学当作哲学的分支学科，而哲学的七个分支学科从来不包括宗教学。只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宗教学是作为独立的人文学科加以研究的。为了明确马克思主义在宗教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新兴的中国宗教学应当旗帜鲜明地称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如同哲学研究包括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分支学科一样，宗教学也应当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西方宗教学区别开来。

^A 吕大吉、龚学增主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代中国宗教卷》，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5页。

其次,关于宗教学研究的内容。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宗教研究领域所走过的历程,体现了一代代学人对宗教学学科建设的理解和诠释。尽管宗教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大体而论,正如任继愈先生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人类各种宗教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走向衰亡的客观规律,涉及各种宗教的历史、现状、经典、教派、教义、神学以及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等内容。宗教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学科理论建设,主要包括科学无神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研究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应当如何对待宗教问题,即相关理论政策研究。为促进科学无神论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所曾经设立过一个研究室,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后来由于人员流失而又未能及时得到补充,无神论研究室未能保存下来,其相关研究工作由宗教学原理室承担。但因原理室人员有限,很难在研究宗教学基础理论的同时,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研究科学无神论,尽管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前世界宗教研究所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从建制上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削弱乃至放弃了无神论研究,宗教学研究就会迷失方向。宗教学研究存在立场或价值取向问题。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在教言教”,而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论研究主体是否为中共党员,都应当是无神论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人类宗教。道理很简单:不是上帝神明创造了人类世界,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神明观念。

最后,关于提升中国学者在宗教学研究中的话语权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话语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内容。话语既是研究主体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构成学术思想的重要元素。数十年来,在宗教学理论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一方面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来诠释人类宗教现象,这种努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和著述成果最为显著。另一方面,在对西方宗教学理论的研究和著述方面,特别是对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和宗教人类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和介绍中,西方宗教学的话语体系则居于主导地位。两种话语体系并存及各说各话的现象十分突出,各有自己的受众,这种状况恐怕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这表明,在新兴的宗教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体系尚未牢固确立,还不够健全。

为了改变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为了不断提升中国学者在宗教学领域的话语权,我们在学科三大体系的建设中应当努力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诠释和运用,应当体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密切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标。这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问题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固然需要在科研实践中努力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当代意义,但尤为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宗教学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二是对宗教观与宗教学关系的理解上需要深化认识、澄清误解。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经典作家虽然也重视宗教问题,但他们只有散见于各篇论著中的“宗教观”,没有现成的宗教学体系可资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西方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学家”,他们也确实没有从学术上提出明确的宗教学体系,但无可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宗教的本质、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的最终消亡、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等相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科学无神论为基础,它同西方宗教学理论体系不属于同一层级,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宗教学深深地受到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的局限和影响,它只关注宗教现象

的分类、解释和描述，而刻意回避上帝神明是否存在的问题。不分析研究事物的本质，也就无从了解和把握客观事物，其理论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宗教观”不同于“宗教学”，但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宗教学的理论基础。

在构建中国特色宗教学三大体系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指导作用，同时又要根据当今中国的国情、社情、教情以及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取得实际成果。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不是封闭的体系，但在借鉴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成果时，包括借鉴西方宗教学成果时，必须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防止简单复制和套用的做法，这需要对西方宗教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需要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

(责任编辑 周广荣)

书讯

《宗教学新论》文丛

作者：卓新平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2021年



该文丛包括《经典与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唯真与求实——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之探》《宗教学史论》《宗教社会论》《宗教文明论》《宗教思想论》《世界宗教论》《中国宗教论》《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文化》《中国基督教》和《反思与会通》，共12部，约450万字，是卓新平研究员对中国宗教学建设的长期思考和新的论述。

《宗教学新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梳理探究宗教学的历史和宗教学的体系，进而展开对世界宗教的全方位研究。文丛名曰新论，一在视野之新，以一种整体论的视域纵观古今宗教研究的历史，横贯中外宗教学的范围；二在理论之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之举，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之论，探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新思路；三为方法之新，既批判性地沿用宗教学历史传统中比较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方法，又结合当代学术最新发展成果来重新整合，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四是反思之新，系作者总结、反思其40余年宗教研究中的体悟、收获、经验与教训，助力新时代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与创新性发展。